

开放中的中国

哈里什·卡普尔 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11
F012
007

开 放 中 的 中 国

——国外专家对我外交政策调整的分析

哈里什·卡普尔 编
光楚、劲军、卫列 译
世璋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北京

The End of an Isolation;

China after Mao

edited by Harish Kapur

根据荷兰马蒂纳斯·尼杰霍夫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开 放 中 的 中 国

——国外专家对我外交政策调整的分析

哈里什·卡普尔 编

光楚、劲军、卫列 译

世璋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6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49-174-9/D·10 定价: 3.60元

编者前言

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是1976年9月毛泽东先生逝世后中国的对外关系。这项研究将为学者们和学生了解中国的非常迅速变化的事件提供可靠的根据。

1982年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亚洲中心成立了一个中国小组，计划编写这本书。该小组就中国对外关系问题展开了生动活泼的讨论和辩论，为计划出版这本书提供了必要的鼓励。由于当时仅涉及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几个方面，我们遂又请了一些专家撰稿，以使本书尽量臻于完善。

本书第三章是一项研究的最新修正稿，原载于我的著作《觉醒中的巨人》中。其他各章或者是彻底修改了的论文，或者是全新的有独到见解的来稿。

我要谢谢这些撰稿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合作，本书就无法出版。不用说，他们是唯一应对所写章节的事实和说明负责的人。

我要对巴巴拉·巴诺英女士协助准备最后的手稿表示感谢。还要谢谢齐纳·格伦德和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秘书处，他们为最后的手稿打字。

哈里什·卡普尔

导 言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最富魅力的领袖的去世，总是带来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卓越领袖的个人特征，在他生前是处处可见的，但他逝世后就开始逐渐消失，曾被普遍认为是外交政策的固定部分，到头来不过是个人的标志罢了。

然而，这种变化的大小和速度依一系列的因素而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人物的集权程度，接班继承是否发生大的问题和外界压力的大小。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掩盖真相的尘埃逐渐落去，一些更为基本的决定因素便开始重新显示出来。这些决定因素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因为它们的多数是国家历史、地理政治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事物必将与旧事物结合，而永久性事物又必须适应瞬息的变化。

在对外政策中，随着新平衡的建立，上述这种连续性和变更性之间似乎是共生的扭斗现象，便最终结束了。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正在经历着这一困难的建立新平衡的过程。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头4年里，中国领导忙于国内事务，以致外交政策未能跳出周恩来在70年代初期设计的外交框架，虽然具有很多新内容，但仍严重地受到以前相当僵硬的教条的制约。

只有在继承问题妥为解决，邓小平领导牢固建立起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容和风格，才可能开始发生有意义的

变化。在80年代的头4年里，中国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变更性，而不是连续性；更加着重日常革新，而不是巩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此外，显而易见的是新领导已确立了新的外交风格。中国过去的文件、声明和评论有许多革命的和战斗性的高调，现在已被温和的、重实效的和低调的文字所取代。代表过去时期中国外交行为的说大话和教训人的语调，已让位于谦逊、谨慎和坦率的语调。

分析方法和组织结构

所以，本书的基本目的就是考察和评估这些变化。象许多已出版的书一样，本书并不遵循任何固定的分析方法。每个投稿人都自由地选择了所写章节的结构，以考察特定的题目，编者无意实行任何的文化独裁。

但是由于编者采用了严格的组织结构，以使本书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弥补了各章分析方法前后不一的缺陷。这是与其它同类出版物有别的。

选择题目是这样进行的，目的是使本书两大部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一部分用传统的方法，集中研究中国与一个国家或一批国家的关系。由于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各不相同，我们采用了三种方法——双边的、三边的和多边的——以便掌握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

莱因哈德·德里夫特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第二章)一文，集中研究了他们的双边关系。这样做是可行的，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基本上未受到其他国家的阻碍或影响。但无可否认，任何双边关系都不完全是双边的。在这高度一体化的世界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派生物。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肯定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反过来，前者也会受到后者

的影响。可是，中日双边关系似乎确实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自主性，这可能是由于它们的关系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也可能是由于日本还远未达到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程度。

然而，乔基姆·格拉比兹在第一章里就论述了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毫无疑问，中国与苏联和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大量地纠缠在一起，而且这三个国家中每个国家的政策对其他两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每一个大国都利用他们的三角关系，以获得对其他两个大国的政治影响。

第三种分析法是多边的，包括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第三章和第四章）。为了集中研究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区域性组织和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哈里什·卡普尔采取了一种高度概括的方法，着重从宏观方面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不是集中注意中国与这些范围的每个成员的关系。

本书第二部分摆脱了传统的方法，集中研究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自1949年以来，有4个主要问题对制订中国对外政策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它们是：安全，革命，现代化和统一祖国。在这一部分里，对这4个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

由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撰写的第五章考察和评估了中国追求安全的问题。由于中国易受武力袭击，而中国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来入侵，又不能靠其他大国的默许保护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中国领导正试图推行“全球和解的外交政策”，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巴巴拉·巴诺英撰写的第六章集中论述了中国的革命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政策调整比较显著。过去毛泽东向莫斯科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挑战，斥责许多共产党为

“修正主义”政党，并坚决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和党的关系的新原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政府和政府的原则极其相似，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较为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自己独立的作用。

由弗里德里克·W·伍(译音)写的第七章强调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巨大变化。中国的“门户开放”和“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新姿态与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社会主义”的旧观念大不相同。但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自力更生”是中国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已相当密切了。

有人会提出：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不可逆转地与世界经济连接在一起，他是否再也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将遭到第三世界国家同样的命运？中国是泱泱大国，并有庞大的经济能够承受国际上很大的震动，但正如伍先生所论证的那样，她比过去肯定更易受到外界波动的影响。

在陈安(译音)写的关于实行新政策而建立的法律和组织结构一文(第八章)中，这种新思想的具体化已很明显。新尝试中有两项重要的内容：1.中国工业经济的大部分已向外国资本开放；2.一些沿海地区进行各种搞活经济的尝试，中央政府只实施非常有限的管制。

新政策在中国经济中引起的变化，从一系列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做生意而通过的立法中可见一斑。大家认为尽管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不可否认，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领导在短短的五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当人们将中国的新思想和新政策与前三十年的思想和政策加以比较时，

尤其会认为是这样。

总之，中国领导已在一个国家内建立了两种平行而又相容的经济制度。当然，这不是新事物，因为一些东欧国家已作过这样的尝试。但真正的创新是建立与大陆其他地方不同的经济特区，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执行新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和行政管理政策，不光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政治动机是同等重要的。中国收回周边地区（香港、澳门和台湾）以统一祖国的重要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新经济尝试的成功与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有效地设置可行的新经济特区，将使最后统一上述周边地区变得容易和顺利。

关于这个问题，由拜伦·S. J. 温（译音）在最后一章报导的中国对香港的新政策，得到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为了顺利地收回香港，及最终收回台湾，中国现领导作了两大让步：

1.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香港已从行政上和经济上与大陆分开。这样做尽管部分原因是为了加速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主要的原因是使香港居民确信，统一香港并不象他们中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坏。
2. 中国当局接受了和平统一领土，并精心制定了外交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赢得香港居民的信任。毫无疑问，这与以前的主张和做法是大不相同的。观察家们认为，香港居民虽对中国关于维持现状的声明不无疑虑，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难道北京当局实行两种不相容的经济制度同时并存的新实验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吗？既然香港的经济实验是成功的，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是高的，这样做会不会使社会主义经济陷入严重的不利地位？人们也会提出中国当局如果把市场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区统一进去，是否会削弱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

事实上中国已走得很远，在不到 5 年的时间里，中国对

外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注意力的焦点已经集中在变更而不是在连续性上。比起关注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来，他更关注的是给他的外交行为发出新的指示和树立新的风格。中国外交调整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变更的过程还会继续下去。在某个时候中国领导必然会将新事物与旧事物结合，将永久性与暂时性结合，从而在连续和变更之间重新建立平衡。

编 者 简 介

哈里什·卡普尔是瑞士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国际关系教授，为该学院亚洲中心主任。在到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之前，他1957—1961年在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任助理法律顾问，1961—1962年任哈佛俄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卡普尔的著作有：《苏俄和1917—1927年的亚洲——苏联对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研究》、《苏联与新出现的国家——苏联对印度的政策研究》、《三角阵式：莫斯科—北京—新德里》、《世界政治中的中国》、《觉醒中的巨人》。

封面设计：刘 扬

ISBN7-80049-174-9

D·10定价：3.60元

目 录

编者前言	(1)
导言	哈里什·卡普尔(1)

第一部分 相互关系

第一章 中国和超级大国	乔基姆·格拉比兹(3)
第二章 中国和日本	莱因哈德·德里夫特(23)
第三章 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哈里什·卡普尔(70)
第四章 中国和第三世界	哈里什·卡普尔(104)

第二部分 决定因素

第五章 追求安全	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151)
第六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和谐音	巴巴拉·巴诺英(177)
第七章 自力更生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弗里德里克·W·伍(译音) (201)
第八章 中国和外国资本：法律和组织结构	陈安(译音) (223)
第九章 统一周边地区：香港问题	拜伦·S·J·温(译音) (261)
译校后记	(306)

第 一 部 分

相 互 关 系

第一章 中国和超级大国

乔基姆·格拉比兹*

回到世界政治舞台

1984年1月，赵紫阳总理访问美国的时候公开宣称，中国在“文化革命”结束后不久就已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决不会再向外部世界关门了。

在构成新政策的决定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点：1.中国过去“左”的某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败；2.中国人在60年代产生一种新观念，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已变得比美国的威胁更大。

1971年至少发生了4件大事，使中国回到国际政治舞台一事变得更加明显。1.中国领导作出重要决定，邀请亨利·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访华，讨论有关中美双边关系的基本问题，并为第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借以缓和与美国的对抗。2.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胜利地结束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所作的长期斗争，并为北京提供了向最重要的国际论坛发表政治和社会经济意见的机

* 乔基姆·格拉比兹，慕尼黑埃本豪生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级成员，兼慕尼黑大学教授。

会。在此以前，这些意见只能在中国宣传媒介或在没有反响的激进的国际会议上发表。3.同年，大多数中国大使在因“文化革命”回国几年后，回到了各自驻在国的岗位。4.到这年为止，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改善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处境。

象往常一样，中国领导试图为国际体系描绘出一个总轮廓，以突出他所认为的国际力量的变化，解释和证明中国新政策是正确的。这首先是邓小平在1974年4月联大特别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中国为回到国际舞台正在大力活动。他讲话的核心包括下列对国际体系的新描述：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此后许多年中，这一重要声明所阐明的观点，在中国的各项声明和评论中都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主要的中国声明或者任何重要的和权威的评论不包括这种对国际体系的描述。

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在毛泽东逝世一年后，《人民日报》透露毛主席是三个世界理论的首创者，从而给这一理论以新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高尚地位。《人民日报》说：

当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积极准备新的战争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

战争政策，推动世界革命前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岁月里，当他的一些思想和政策已开始受到怀疑的时候，三个世界的理论仍被认为是正确的。例如，迟至1981年4月，中国的资料仍说：

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尽管他在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的许多观点，例如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正确的。

重新考虑三个世界理论

然而，在1981年，这一理论在官方声明中已经消失了，它不再构成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核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9月召开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提到这一理论。1982年11月《红旗》杂志刊载一篇涉及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文章，也没有出现这一理论。

可以认为，尽管三个世界理论在70年代代表中国官方的观点，但在80年代似已不再把这种观点作为解释世界的正确手段。在1981、1982年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官方声明中，对源出于三个世界理论的与当前外交政策很难一致的某些观点，作了明显的修改。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对苏联的新评价。1974年公布这一理论时，苏联被指责为比美国“更加凶恶”，已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最危险的根源”。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指责苏联共产党已成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政党”，说在苏联“完全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已把苏联劳动人民的祖国变成恐怖的世界。中国人的愤怒程度，从中国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支持不满反动统治的苏联工人，